

《好逑传》的首译考

费毓龙

翻开中英文化交流的篇章，中国小说首次被译成英文的是明末清初刊行的《好逑传》。它的首译本于一七六一年问世，距今已有二百二十五年了。可是它的译者是谁？是译自中文还是葡萄牙文？这始终是一个谜。近百年来，历史学家，文学家或版本学家对这两个问题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好逑传》又名《侠义风月传》题名“名教中人编次”是一部长篇小说，共分十八回。它主要叙述了男女主角——铁中玉和水冰心的婚姻故事，对封建社会的恶势力有所揭露，但也宣扬了名教和封建的道德观念。

这位“名教中人”所编的《好逑传》在中国小说史上并不占重要地位，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把它列在明代人情小说类，与《平山冷燕》、《玉娇梨》一起，对它的提要也是一笔带过。但是这部在中国不受重视的《好逑传》，其英译本自一七六一年于伦敦问世以来，竟在欧洲引起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被各国竞相翻译，时间长达一百几十年。

英译本的题名是：Hau Kiou Choaan or the Pleasing History, a translation from the Chinese language, to which are added, I, The augment or story of a Chinese Play, II, A collection of Chinese Proverbs, and III, Fragments of Chinese Poetry, in four volumes, with notes... London, printed for R. and J. Dodsley in Pall-mall, MDCCLXI, 全书共分四卷，每卷十回，共计四十回。第三卷卷末附《中国格言集》；第四卷卷末附《一部中国戏剧的梗概》，《中国诗歌片断》，但译者佚名。

该书自一七六一年出版后，很快受到欧

洲人士的注意。五年以后，法文四卷译本于一七六六年在里昂由杜波兰书店（Benoit Duplain）出版，译者也告佚名，题名为：Hau Kiou Choaan, Histoire Chinoise, Tradite de l'Anglois, par M. (A. Eidous). A Lyon, Chez Benoit Duplain... M. DCC. LXVI 同年，德文四卷译本也于莱比锡，由荣涅乌斯书店出版，译者为德国早期汉学家慕尔（C. G. von Murr）题名 Hao Kjoh Tschwen, d. i. die angenehme Geschichte des Hauh K joh. Ein chinsischer Roman, in vier Buchern, Aus dem Chinesische in das Englische... Leipzig, bey Johann Friedrich Junius, 1766.

英译本的问世，无疑帮助了《好逑传》在欧洲的传播。翌年（一七六七），荷兰文四卷译本又告出版，题名 Chineesche Geschiedenis, behelzende de gevallen van den heer Tieh-Chung U en de jongvrouw Shuey-ping—Sin... Te Amsterdam, By de Erven van F. Houtuyn, 1767. 荷兰文的译本一如法、德译本，同样保留了英译本的三种附录，未加删节，所不同的是这一译本的题名《好逑传》的音译被略去，借用《好逑传》中两个主角的姓名铁中玉和水冰心为题目，这种文种的译本都转译自英译本，明显地说明了英译《好逑传》在欧洲的影响。

可是日本著名的汉学家盐谷温在大正七年梓行问世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里却忽略了这一英译本的存在，甚至连早期的法、德、荷三种译本都未提及，他只提到一八二九年英国约翰·戴维斯（John Davies）和一八四一年法国达尔西（D'Arcy）两人的英、法重译本，似乎他根本不知一七六一年至一七六七年之间的版本，但是他在《讲话》中

却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他留德期间在席勒纪念馆，见到了席勒亲笔所译《好逑传》的一纸手稿。这说明席勒也曾受到这些译本的影响，曾试图重译。

此后《好逑传》的逐译冷落了半个多世纪，也许由于这些法、德、荷的译本都是根据英译本而来，加上英译本又是首译，难免有许多差错不能使西方读者领会这部《好逑传》的原来韵味，所以在一八二八年又有一种法文新译本问世，由巴黎摩塔底埃（Moutardier）书店出版。题名为 *Hau—Kiou—Chooan, ou l'Union bien assortie, Roman chinois* Paris, Moutardier, 1828) 全书也分四册。译者姓名也是不详且也是无从考证，但这一法文译本也并不是直接译自中文，它的序言中有一段话：“我们出版译本，是根据一个在东印度公司服务，又曾在广州居住过的英国人的译本。”这位在东印度公司服务，又曾在广州居住过的英国人就是戴维斯。他的英文重译本反而迟至一八二九年在伦敦由东方翻译基金委员会出版，全书共分二册。题名是，*The Fortune Union, a Romance,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Original, with Notes and illustrations...* By John Francis Davis, F.R.S.C. London printed for the Oriental Translation Fund... 1829)。这一译本是根据中文重新翻译，题名也从音译改成意译。

至于法文的新译本则迟至一八四二年才于巴黎出版，由达尔西执笔。

继这些译本之后，欧洲重译《好逑传》的势头仍旧不衰。一八九五年勃兰布纳（Alexander Brebner）著《中国历史简编》（附中国小说一篇）（*A little History of China and a Chinese Story*）所附的那篇小说就是《好逑传》的重译本的节写本。因此，该书并无多大的意义和价值。

一八九九年《好逑传》的另一节写本又在伦敦保罗书店（Kegan paul）出版，译者

也是佚名。据版本学家高底埃考证，该书是据一八二九年戴维斯的新译本节写的。

一九〇〇年以后，又有多种新译本出现。如陶格拉斯（Douglas）保勒（Baller）、贝克福特（Beckford）、琼斯（Jones）等人的译本。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二五年莫朗（George Soulie de Mourant）的法文新译本，题名是《二才子风月传》（*La brise au Claire du Lune, Le deuxieme Livre de Genie*），莫朗是才学渊博的汉学家，他运用法国数百年来所积累的汉学功力，从事这一译作，其成功是被人们所肯定的。

综观上述的各种译本，足见一七六一年英译本《好逑传》所产生的影响之深远。它能够从十八世纪中叶延绵至二十世纪，在中国小说的西文译本中实为罕见。因此，无论从比较文学史的角度来衡量，或是从中英文化交流史来看，这一部一七六一的英译本都可以作为值得纪念的里程碑。

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欧洲不率先译述《三国》、《水浒》、《西游》，而要选中不为我国所重视的《好逑传》呢？有人认为当时西方还没有见到上述著作。笔者对此不敢苟同。从明末耶稣会传教士来华开始，他们经过在澳门学习中文后，其中文的功底已完全可以和当时的士大夫应答。万历野获篇称利玛窦“初来华时寓香山沃，学华言、课华书凡二十年”。一六五九年鲁日满（F. De Rougemont）来华传教即在文风荟萃的江浙两省与士大夫交往。陈大年维崧湖海楼词集卷十一有赠大西洋鲁君一词即鲁日满。他们耳濡目染，对中国的文化不可能一无所知，而是理应有一定的了解。一七三五年杜阿德在《中国志》中就收集了《今古奇观》的《吕大郎还金完骨肉》的译文以及马若瑟所译元曲《赵氏孤儿大报仇》，这就可证明当时西方不可能不知道《三国》等著名小说。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动笔译述呢？

人们知道，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译述都

和译者所处的时代相联系,又和译者的经历和思想密不可分的,回看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正如莱布尼茨所指出的:“在我看来,我们目前的情况,道德腐败,漫无止境,有必要请中国派遣人员来教导我们。”《好述传》是一部提倡名教的小说,其英译的时间正是处在西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蓬勃兴起,而精神世界逐渐衰败的时候。从一七六一年英译本的献词中撰者就清楚地表明翻译的目的是从德道观念出发的。此外,这部译作在欧洲一百多年中之所以引起如此重视是与欧洲人借此了解中国的民俗、道德、生活习惯相关连的。反之,《三国》、《水浒》、《西游》西译比较迟,大都经过片断翻译、节译、意译直到全译的过程。如《红楼梦》、《西游记》最早的译本都十分简略,情节、人物也有失真之处。以当时的水平来说,要设想译者能锲而不舍地,完整地翻译这些小说,必然要具备中国文化的根基、宗教、历史、文学等等素养,才能将这些深奥的章节及难译的诗词奉献给西方的读者。事实上在当时是十分困难的,即使以《好述传》的首译本来说,也有不少略去之处包括每回的“探头”。按第四卷的译者珀西的说法是“略去那些粗野的、文理不通之处”,事实上对照原著,首译本所略去的也不尽是粗鄙之处,实际上还是译者功力深浅的表现,所以从译笔质量来说,首译本与一九二八年的译本相比,差距是很大的。

因此说当时西方还不知道《三国》等著名小说,立论是难成立的。

最后,要考证一七六一年伦敦英译《好述传》是译自中文原本还是葡萄牙文的问题,这还得要听听《好述传》的第四卷的译者,珀西所说的话:“原稿是从英人韦金生(Wilkinson)的遗稿里发现的。发现时有四分之三是英文稿,四分之一,也就是最后的一部份是葡文。”珀西就将这一部份葡文转译成英文,然后付印。出版后,在书名页上竟

一反惯例未将译者姓名刊载。从献词,序言中也未作任何记载。这样,究竟谁是译者又成了二百多年来难解的谜。要试图解答这一问题,摘译序言的重要部份来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序言的开始部份如下:

“译稿是一位曾与东印度公司有密切关系而又经常住在广州多年的先生的遗稿中发现的。他的亲戚相信他曾对华语极感兴趣。他们相信这一译稿(至少一部份)是他研究中文的习作。译稿中有许多书缘旁注。这证明他在学习中文时所注。而且在遗稿中有不少之处是用铅笔先写,经润色后才用墨笔描上。这似乎是在中国教师的指导下写成的,译稿是写在四本薄薄的中国纸上,对开本,按中国传统装订,书口相连,书背截开,第一册至第三册是英文,第四册是葡文,这两种文字的笔迹不同。最后一本由编者译成我国语言。”

这篇序言经伟力亚烈考证,认为是珀西所撰。序言中的编者即珀西自己。

根据序言中所提供的线索,海外学者对英译本是译自中文或葡文持分歧意见者大致有四种。

(一)一八二九年《每季评论》(Quarterly Review)曾刊载一隐名著者的考证。他对韦金生在当时具有翻译中文小说的能力是抱怀疑态度的。

(二)埃达·密尔纳—巴黎认为全书是根据葡文翻译的。

(三)高森(Gaussen)认为全书是从葡文转译、再由韦金生译为英文,最后由珀西润笔。

(四)鲍威尔(Powell)认为一七六一年的原文四分之三是中文,而四分之一是葡文。

以上是四家主要论点,但各有偏颇。

要考证原本的问题,一方面须从一七六一年的英译本与中文原本对照研究,更重要的是必须从中西交通的角度来研究在当时葡

英两方，以何方的中文素养为好。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回顾一四六〇年葡萄牙航海家已探至非洲西岸。一四九八年，伽玛（Vasco da Gama）抵达郑和所达的古里（Calicut）据《名山藏》称：“佛郎机（即葡萄牙）有使者曰亚三，能通番汉，贿江彬，荐之武宗，从巡幸。武宗见亚三时时学其语，以为乐。”（王享记 满刺加篇）。这说明早在明朝正德年间，葡人已来中国。一五一七年葡萄牙第一任使者毕勒氏（Thomas Peres）来华。一五一七年后，马喀兰夏（George Mascarenhas）抵福建。他在泉州、福州、宁波开辟贸易，并在宁波设殖民区。由于他们逐渐骄横无礼，最后遭到明帝的驱逐。一五四九年在泉州的葡人也被驱逐。至一五五七年他们向中国官方行贿，得以定居澳门。崇祯年间，葡人陆若汉（J. Rodrigues）曾率澳门葡兵助孙元化。朝鲜人安应昂《考同考异》第二十二册《西洋问答》也曾收陆若汉答李荣后书。其行文流畅，用辞典雅，很难设想出自一位外籍人士，因此，明末耶稣会会士来华传教必先澳门学习中文。

这些都说明葡萄牙与中国的往来已久，他们之中对中文深有造诣者也不乏其人。

反看中英之间的交往，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成立是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他们在东方能够活跃还是十七世纪以来的事。东印度公司第一条船到达中国是在一六四四年。一六九九年东印度公司劳埃德（Lloyd）

据说是第一个能够懂华语的英国人。一七三六年东印度公司开始留了两个英国青年在广州学习中文，他们是洪任辉（James Flint）和贝汶（Thomas Bevan）。在这以前他们要了解中国情况或写呈文，不是借助于传教士就是中国的“奸棍”。到了乾隆十九年，（1754年）他们才能自己写禀帖，直接与我国官方谈判。清朝是严禁外人学习中文的。乾隆廿四年，刘亚匾就因教外人学习中文而被处极刑。当然禁令不一定生效，但从葡英两国与中国的交往无论从贸易或文字传习来看，其时间差距很大。所以说，当时英国在广州的人员是万难胜任译述这一小说的。

那么，一七六一年译本的译者究竟是谁？据伟力亚烈的考证“稿本是从一个曾在广州住过而又曾学习过中文的韦金生的稿件中发现的。稿上写着一七一九年，就是他回国的一年。他死于一七三六年。前三卷是英文，后一卷是葡文。特洛摩尔主教（Bishop of Dromore）珀西博士将第四卷译为英文，并校订全书。”

根据上述的历史情况，很可能韦金生从葡人学习中文，或从中国人学习中文。由于他对《好逑传》所宣扬的名教思想颇有兴趣，因而借助葡译，对照中文译成英文，在未译完前而去世，存下最后一部份由珀西完成。

看来这两个谜似乎略为解开了些，但显然还没有得到完全满意的结果。还需要同行们和学术界同心协力来解开这一难题。

Summary

UAP in China

From 12 to 16 June, 1986 a National Seminar on UAP was held in Beijing, China. Publishers, librarians and information specialists who came from 23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all over China attended the meeting. 43 reports were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Among them Mr. Shao's report entitled "UAP in China" was taken as the major one.

Shao provides an overall review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UAP in China. Report begins with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concept, objective and scope of UAP. Following contents consist of five parts — users and their needs for publications, production and supply of publications, acquisitio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interlending, reten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publications.

China has made remarkable progress in respect of implementation of UAP. But, to achieve the goal of UAP, as a developing country, China has a long way to go. Constraints and obstacles are identified. To improve the availability of publications, appropriate measures are being adopted. (page 23)

A research on the earliest foreign languages translations of "Hau Kiu Choo-an" or "the Pleasing History"

The novel, Hao Qiu Zhuan, in eighteen chapters, was published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It is a tale of the marriage of the two main characters — Tie Zhong Yu and Shui Bin Xing. Although it is very lightly esteemed by scholars in our country, yet it was once frequently commended by foreigners in Europe and repeatedly translated into several European languages during the past centuries.

Nobody can definitely tell who the translator was or which original version, the Chinese or the Portuguese, the translator based upon, but it is still considered as a milestone in the history of Sino-British cultural relation or th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age 66)

Contemplations on building up library science in contemporary era

The article describes a change from critical to constructional attitude towards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It is suggested that some new values of theory and ways of thought be established in the research of library science. (page 75)

On the difference of opinion regarding Mao Yi's first four collations of the famous ancient Chinese dictionary "Shuo Wen Jie Zi"

Based on his research, the author refutes the inference upon untrue evidences